本版编辑：龚克　E-mail:gongke@ccps.gov.cn　Tel:010—62806124　　2015年5月11日

新时期论坛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党智慧

□王保庆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党管党理念的重要来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影响和重要意义，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党管党智慧，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的实践问题。

我们党高度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建党智慧。毛泽东明确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就高度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建党智慧，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建党思想。例如，党汲取中国传统文化重教化、重修养的求是精神，形成了浓厚学习氛围和注重学风建设的特点；汲取中国传统文化讲求“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民为重，社稷次之”的民本思维，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汲取中国传统文化“诚意”“修身”注重道德伦理修养的“士大夫”情怀，形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期，我们党更要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党管党的智慧，不断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能够与自己的历史一刀两断，传统是扔不掉的。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实现现代化，只能是在自己传统基础上的现代化。不识祖不成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今人不应该放弃从古人那里寻找智慧。因此，在新的形势面前，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培育民族精神，为执政党建设提供政治营养和有益补充，使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大而严肃的现实课题。目前，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党建理论结合起来开展研究，则还有相当大的拓展空间。在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为执政党建设提供文化滋养方面，仍然任重而道远。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增强道路自信。作为国家的执政党，道路选择至关重要。解决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然需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不是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而是要从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出发来创造性前进。中国道路扎根于中国文化的沃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我们之所以对中国道路有坚定的自信，就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改革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深厚的文化滋养。例如，“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强调的就是改革需要摒弃不合时宜的旧观念，冲破制约发展的旧框框，让各种发展活力充分迸发出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论述的是推进深水区改革需要啃下最难啃的硬骨头，打破利益藩篱，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启示我们推进改革的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廉洁智慧。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自古以来，我国哲人便十分强调修养道德，道德始终是立身处世的根本。“道私者乱，道法者治”“奢靡之始，危亡之渐”，透过这些传统文化论述，可以挖掘出从严治党、加强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新内涵，警示各级领导干部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不断增强是非面前的辨别能力、诱惑面前的自控能力、错误面前的醒悟能力，不断提高慎权、慎独、慎微、慎友的自觉性。领导干部需要多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经常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汲取前人修身处世、为官用权的智慧。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党智慧，需要系统深入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例如，对传统文化与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的结合等，就需要分别作专题研究。再如，对实事求是的思想传统与党的思想路线、传统治国思想与党的德法并重执政理念、民本主张与党的宗旨、传统富民经济思想与党的基本路线、传统用人思想与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古代人才选拔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传统官德思想与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传统廉政文化与反腐倡廉建设、中国古代巡视制度变迁及其当代价值、古代家训与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传统文化对党风廉政建设的影响及其当代功用等，也都需要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特别是，对执政党如何吸收借鉴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官吏考核制度、监察制度的科学成分与合理因素，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领导干部选拔考核制度和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等，都有相当大的研究和实践空间。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党智慧，需要注意反对国粹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两种错误倾向。要划清封建腐朽思想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限，深刻分析并彻底摈弃封建专制思想、官僚主义作风、封建宗法观念、官本位意识以及其他封建没落思想，努力消除这些封建糟粕对执政党建设的不良影响。加强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还要注重学习和借鉴国外政党建设的经验，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起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管党治党新路。

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的配合与支援

□刘庭华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条件下进行的，在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统一战略目标下形成了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各自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相互配合，对侵华日军形成两面夹击的战略布局，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上的成功杰作，这一特殊的战争形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中外战争史上绝无仅有。

两个战场对日军形成夹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辟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正面战场相配合对日军形成战略夹击的战略格局，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是日军展开战略进攻，中国军队处于战略防御，这是无从选择的。而敌后战场则不然，它不能自然形成，必须靠战争指导者在知己知彼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性和创造性去开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开始前后，全面科学地分析中日战争的形势和敌、我、友三方的具体情况，认为：由于敌强我弱，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中国在军事上单靠正面防御是难以取胜的，还必须到敌人的后方去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由于敌小我大，这决定了日军在中国占据的地域越大，其兵力就越不足，日军只能控制交通线和城镇，这样，敌后广大乡村地带必然成为开辟抗日根据地的理想区域；国民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和拥有200多万军队，其装备水平远远高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且控制全国资源，有力量正面御敌；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政治素质高，善于做群众工作，长于游击战和运动战，独立作战和生存能力强，适于担负开辟敌后战场任务。因而，“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统一战线内的这种分工，既符合全国抗战军事战略上的需要，又符合国共两党和两军的自身情况。两个战场缺一不可，在统一战线旗帜下，发挥各自的优长，采取不同的作战形式和手段，以抗击日本侵略军。两个战场的相互配合，构成了有利的战略布局。

积极配合与支援

全国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和国民党军队主要是战役上的配合。在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败退之际，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日前线，首战平型关，歼敌精锐1000余人，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民心士气。接着，配合友军保卫忻口、太原，在同蒲路北段和正太路上沉重打击日军，掩护友军的退却。太原失陷后，友军南撤，在华北以国民党军为主力的正面战争结束，以八路军为主力的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八路军展开于晋东北、晋西北、晋西南，对占据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敌采取四面包围的战略态势，从而初步形成了以山西为主的敌后战场。尔后，依托山区，发展平原，迅速扩展到晋、察、冀、绥、鲁、豫等省的广大地区，形成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在华中，当日军攻占上海、南京继续西进之际，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配合友军作战，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在华南，当日军攻占广州和海南岛时，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珠江、琼崖等抗日游击队，积极打击日军，配合友军作战，形成华南敌后战场。东北抗日联军在“七七事变”前后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形成东北敌后战场，牵制日本关东军，对关内抗战起到了战略配合作用。

敌后战场形成后，在战略上积极配合和支援正面战场。第一，作战行动上的配合、支援与策应。当国民党军队与日军进行徐州、武汉会战时，八路军以主力一部挺进冀鲁平原，牵制日军第2军，威胁其后方，分散其兵力。同时，以晋冀豫、晋察冀边区部队破袭平汉、津浦的铁路交通，以支援正面战场。特别是1940年6—7月间，当日军加紧政治诱降，并攻占宜昌，造成溯江而上威胁重庆之势时，八路军于8月在华北敌后战场，发动了有105个团20万人参加的“百团大战”，时间长达5个多月，歼灭日伪军4万多人，瘫痪了日军的主要交通线，把日军的主要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极大地支援了正面战场。对此，蒋介石在给八路军的嘉奖电上称：“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以致命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之鼓舞。”此后，日军由华中抽调两个师团的兵力加强其华北方面军的力量，对付八路军。1944年春，当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妄图打通中国大陆至东南亚的交通线，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又一次大败退时，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敌后战场发起强大攻势，实施局部反攻，有力地打击牵制了日军，使沿平汉路南下的华北日军，在进攻至平汉线南段之后，不得不回师华北。这些都是在战略上对正面战场的有效配合和支援。第二，战略、战役指导上的协商与建议。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提出了《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并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为代表，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积极建议全国抗战应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外线速决运动战的作战指导原则。当国民党军与日军进行忻口、太原会战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向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建议：要加强娘子关和龙泉关的防守；战役部署上应将主力置于日军两翼，一部扼守正面阵地。然而，这些建议并未被接受，导致日军突破娘子关，威胁太原侧后，造成全线溃败、太原失守的危局。在正面战场第五战区进行徐州会战时，周恩来、叶剑英等积极向李宗仁、白崇禧建议：在津浦路南段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阻敌北上；在津浦路北段，以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守点打援，各个击破，并派张爱萍到徐州向李宗仁进一步阐明这一战役指导方针，得到李宗仁的赞同，从而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

在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对敌后战场的配合、支援也是比较好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作为日军的主攻目标，抗击了日军的主要兵力，因而它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历时一年零四个月，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忻口、淞沪、徐州和武汉四次大规模战略防御性战役，共毙伤俘日军25万余人，牵制日军70余万。国民党军为此付出了伤亡104万余人的重大代价，正面战场为彻底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等在敌后实施战略展开，与国民党军形成有效配合，在敌后战场形成之初反击日军围攻的作战中，国民党军或直接配属八路军参加反围攻作战，或间接配合，都曾起到了积极作用。1938年2—3月间，八路军第120师在反击日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围攻的作战中，得到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的积极配合，从而粉碎了日军的围攻，并收复了7座县城。4月，八路军总部指挥第129师、第115师第344旅和山西新军一部，在配属的国民党军2个军另3个师的积极配合下，粉碎了日军3万余人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并收复县城17座。正是由于两个战场的战略布局和战略防御阶段相互积极配合，从而陷敌于两面作战、腹背受击的被动局面，迫使日军停止战略进攻，放弃速战速决，改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从此，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抗日军民在侵华日军后方开辟的广大敌后战场，对其构成致命威胁，迫使日军不得不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转移其主要力量用于对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这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日的重担就历史地落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军民肩上，敌后战场也就逐渐成为抗战的主战场。

敌后战场发挥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是建立抗日军事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具有抗日的坚定性，它在整个抗日作战中，从来没有动摇过；而它的英勇抗战精神，特别是随着人民武装力量和敌后战场的扩大，又极大地鼓舞着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和胜利信心。

对建立抗日军事统一战线的忠诚性。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首先提出停止内战，而且表现在整个抗战期间忠守诺言，总是以团结抗日为大局，以友好的态度对待友军。抗战期间，虽然顽固派搞一些军事“磨擦”，或者勾结日伪军搞腹背夹击，甚至发生过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一直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着重打击和揭露少数顽固派的破坏阴谋，使两个战场对日作战的相互配合、协助，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两个战场同时打击侵华日军，使其顾此失彼，这既有利于消灭敌人，又有利于保存自己，由被动变主动，由弱变强。八年中，两个战场共进行重大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20万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伪军118万人，接受投降日军128万余人。不难想象，如果只有一个战场，那么日军就可以毫无顾忌地集中全力于一线作战，并且可以充分利用其占领区的人力、物力等资源，不断增强其战争力量，使其“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战略图谋得逞。虽然两个战场的配合并未尽如人意，但两个战场都功不可没。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战胜强大的敌人，要独立、富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团结一致，和衷共济。

理论研究

哲学发展要直面中国问题

□方兰欣

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都是对时代问题的思考与解答。发展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又要直面当下中国社会，关注人的生存境遇，破解社会发展难题。

科学性与人文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吸收人类社会发展文明的最新成果基础上，提炼革命实践活动经验形成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唯心主义哲学的虚幻性与欺骗性，指出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关注现实，强调物质世界的基础性地位，努力探索解释世界、变革世界的可行路径。但是，第二国际时期的一些理论家片面强调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经济因素，遗忘或忽视了马克思所强调的历史辩证法，将辩证唯物主义扭曲为“经济决定论”。过分强调物质世界及其发展规律，人的能动性主体地位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压抑。长期以来，我们接受的主要是一种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唯物史观，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相对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性特征，这对我国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今天，我们发展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需要兼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既要防止遗忘物质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基础性地位而滑入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阵营，也要避免因忽视甚至无视人的主体性地位而形成的宿命论思想。今天，我们国家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的人文素养与社会文明程度显然并未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价值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不是很强，文化软实力发展不足，从而限制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话语权与影响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既要见物，更要见人，要特别突出并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哲学研究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日常生活介入，提高文化亲和力，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内涵、人文底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可亲、可信、可用的看家本领。

社会批判与社会建设

马克思反对哲学的世俗化，主张哲学“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这种批判不惧怕结论对自身的伤害，也不怕与各种现有势力发生冲突，实际上就是一种“变革世界”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围绕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境遇，对封建特权、宗教虚幻观念、资本主义抽象权利，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生存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今天，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了中国执政党，由革命者转变为建设者与改革者。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发展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既要对习以为常的现实进行批判反思，更要积极引导人们的精神世界重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的物质财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精神世界的发展相对不足。当前社会物化生存现象比较严重。我们的生活过度依赖商品，人际交往通过物来实现。拜金主义思想比较普遍，甚至出现了“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的“拜金女”。一部分人通过名牌、奢侈品、金钱等物的消费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物化思想使一部分人只注重物质享受，不大在意文化修养。社会呼唤思想的力量，生活需要哲学的慰藉。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哲学来进行灵魂的净化、欲望的规制，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认识世界、答疑解惑、指导人生。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关注当下中国人的物化生存问题，并为克服商品崇拜、货币崇拜提供思想理论源泉，重建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我国千百年来形成了浓厚的权力文化观念，人们畏惧权力、依赖权力，权力思维盛行。能力则不同于权力。能力本位社会引导人们自力更生，自立自强，强调后天作为，注重内在实力提升，琢磨技术，琢磨科学，琢磨事情，强调干好事业。能力本位社会解放人，开发人的潜力，鼓励个人奋斗与创新，有利于增强社会创新活力。由权力本位社会转向能力本位社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所应当承担起批判权力本位、官本位的重任，助力民族理性思维、自由精神与独立人格的形成，坚持以人为本，倡导正确的权力观、人生观，推动能力本位社会与创新型国家建设。

实践与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本质特征使其不断超越理论哲学仅仅满足于“解释世界”的局限性。作为我们党的思想基础，必须立足中国社会实际情况。这就要求哲学工作者坚持大众立场、问题意识导向、凝聚各方共识与力量，服务国家建设、破解发展难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面向中国问题，立足社会实际与服务国家建设并不是要将哲学变成一种类似于实证科学的科学。而是说党员干部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与思维方式治国理政，提高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哲学研究要避免脱离时代与实际，避免脱离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及其生活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为社会大众理性谋划人生，客观认识事物，正确驾驭和处理复杂的矛盾关系提供正确的人生观与方法论指导。

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应当深化自身理论素养，提高理论自身的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即理论和实践的总体性统一的原则。实践的客观性蕴含着革命性的力量，理论的科学性具有批判性的功能。由此，哲学得以存在于纯粹的观念体系之中，更可以存活于各种具体理论和社会实践之中，成为理论和实践的内在的本质精神。理论如果不系统、不完善、不彻底，实践活动早晚会栽大跟头。因此，面向中国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实践经验的层面，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实证科学的层面，还应当尽可能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理论思辨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需要在现实实践层面同理论思辨与理论顶层设计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与平衡。坚持实践优先，但又要努力超越实践经验的特殊性局限而上升到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高度，并用以指导实践。既要关照中国社会，并对实际问题与现象进行总结和反思，也要不断增强理论的彻底性，提出更加深邃、更具穿透力的理念与思想，发挥理论指导实践、引领社会发展的功能。